

日出东方

下

三十六集文献专题片
● 邹运韬出品 ●

中国改革开放大写真

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

——习近平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日出东方

下

中国改革开放大写真

三十六集文献专题片

· 邹运韬出品 ·

第三十六章 稳定政策 “傻子瓜子”不能动 全国首家 “悦宾饭馆”个体户

如果说万里治皖，在农村改革中，和省委一班人马搞出了个“包产到户”功不可没的话；随后的张劲夫治皖，则在城市个体经济的探索中，推出了个“个体户”典型——年广久。

当包产到户的争论尘埃落定之时。芜湖市又为一个炒瓜子的小贩子争论不休。这个小贩子就是年广久。

年广久，是淮河岸边的怀远县人，小时候要饭要到了芜湖，跟着父亲做起了小买卖，目不识丁的他在街头叫卖，摆水果摊。解放后，他还是爱偷偷地做小生意，1963年，因贩卖板栗被判处“投机倒把罪”入狱一年。1972年，出狱后，他本性难改，开始“转行”炒瓜子、卖瓜子。为了躲避城市管理人员，他当起了“游击队员”，时而拎着小篮，时而提着口袋，沿街叫卖5分钱一小纸包的瓜子，他卖的瓜子便宜又味道好，有时还买一送一，人曰其傻，背后叫他“傻子”，时间一长，年广久也不生气，甘当“傻子”不说，还干脆把自己的瓜子也叫做“傻子瓜子”。

“四人帮”垮台后，39岁的年广久干脆在芜湖中山路闹市的道门巷口用一辆旧板车摆起了瓜子摊，生意越做越旺，炒瓜子卖的越来越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推行承包生产责任制，年广久也琢磨着如何把生意做大，开始从农村收购生瓜子，炒制销售。别人收买生瓜子，都是货到付款。可他犯“傻”对出售生瓜子的农

民热情招待，早晨来的，供应早点；中午来的，招待便饭；晚上来的，介绍住宿。结果，别人愁货源断档时，他家送货上门的络绎不绝。但年广久瓜子要提高销售量，必须迎合顾客口味，改进炒制瓜子的质量。于是，他东走南京、无锡、苏州、上海，西走江西、武汉等主要瓜子产地，拜师取经。每到一地，他就花一毛钱买包瓜子尝尝，琢磨它们的特点，从配料、翻炒、火候上总结他们的经验。遇上风味更佳的，便登门拜访，掌握了椒盐、奶油、桂花、甘草、玫瑰、百合、辣椒、臭卤、五香等 72 个品种的不同配料。他外出调查了 100 多天，回到芜湖时，他决定博采众家之长，创制一种溶南北口味于一炉的新味瓜子。经过改进佐料配方，提高炒货的水平，他炒出的瓜子入口香甜，一嗑三瓣，就是不会嗑瓜子的人也能嗑上瘾，“傻子瓜子”出名了。很快，他成为了当地令人称羡的“万元户”。他炒出的瓜子在市场大受欢迎，日产量从原来几十斤增到 200 斤，月营业额达万元。年广九一个人忙不过来了，偷偷地雇起了帮工。

1981 年，张劲夫和安徽省委在城市改革中，宣布对个体经济采取扶植政策。这使得年广久看到了更大的希望，为招揽顾客，他把竞争的目标对准了国营商店。这时国营商店的瓜子牌价是每斤 1.95 元，个体户一般则卖 2 元至 2.2 元。8 月的一天，年广久突然宣布他的“傻子瓜子”大降价，零售价格每斤降为 1.76 元。同时，在他炒货摊上，谁都可以随便抓一把品尝，不收钱，买后发现不足秤的，他少一两罚一斤。9 月 12 日，《芜湖日报》在显著位置刊载了《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记个体经营户年广久》的报道。“傻子瓜子”的名声更响了，年广久的摊前被围得水泄不通，百来斤的瓜子一售而空。生意高手年广久又在摊前贴出告示：“烈军属、现役军人、新婚夫妇、残疾人、老人小孩，均可凭户口本优先供应瓜子 2 斤。”

年广久的几招完全占据了芜湖的瓜子市场，就是老牌的国营商店也望尘莫及了。

生意一做大，人手就越不够，年广久又雇了 4 人作帮手，后来

还是忙不过来，雇工人数从9人、30多人、60多人，人数越来越多。同时，他的长子年金宝也雇上了40多人开办金宝炒货店，产品也使用“傻子瓜子”商标，父子俩的雇工合起来达到了140多人，日产瓜子逾万斤，月营业额达60万元。

“傻子瓜子”雇工现象，立即引起褒贬不一的评价与激烈争论。

在改革之前，搞个体、做生意，就是搞资本主义，是要批判和处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左”以后，个体经济得到了正名，被明确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81年7月1日，国务院在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中还规定：“个体经营户，必要时，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二、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年广久父子雇了100多号人，是否属于剥削？社会主义还能不能搞雇工？因为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就非常明确地肯定“雇工在8人以上就有剥削”。安徽的“傻子瓜子”雇工与广东的陈志雄养鱼塘雇工都远远超过了8人，他们的“剥削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在这关键时刻，周曰礼派省委农工部干部杨绩龄悄悄去了趟芜湖，专门调查年广久现象。杨绩龄也是位“改革促进派”。他经过调查，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基本上肯定了雇工的做法，并提出应该允许他们存在和发展。周曰礼把报告印了200份，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散发。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看到后，说：“很好，很有典型意义。”又特地材料送给邓小平阅。

但是，如何看待雇工经营这一新事物，党中央还是持慎重的态度，采取了“看一看”的方针，既不取缔、禁止，也不鼓励、提倡。然而，年广久和陈志雄的“雇工剥削”一经披露，在全国各媒体的讨论没有停息，并且参与讨论的人越来越多，赞成的反对的莫衷一是。1982年，赵紫阳对《中国财贸报》编辑部提出的“傻子瓜子”问题做出了批示：“对这件事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资本主义要取消；另一种认为，这些事给我们以启示：这样会经营的人才，为什么三十年来不能发挥作用？我们能不能找出这样一条路子，既能发挥人才的作用，又能克服消极的方面。”

这个批示转到了安徽省委，省委书记张劲夫、省长周子健批示组成一个调查组，专程去芜湖市调查了解情况，并提出意见。

9月28日，安徽省副省长胡坦向省委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提出三条意见：（1）年广久确有技术专长，炒出的瓜子质量好，价格便宜，既丰富了市场，又创出了名牌，得到群众好评。……年广久生产效率高，费用成本低，经营管理好。这些积极作用应当受到保护和继续发挥，也值得国营商业从中学习一些有益的东西。（2）对年广久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有些问题一时拿不准的，可以先看一看，不必急于处理。与国家政策不符的，如雇工人数、少交税款、货源供应、经营形式等问题，这要发挥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强管理，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必要的调节和限制。（3）国营商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展竞争。

1983年3月，总书记胡耀邦去芜湖市视察。在合肥时，他听了安徽省委书记张劲夫对“傻子瓜子”问题的汇报，当张劲夫提出如何处理时，胡耀邦说：“三十几个人嘛，不要动他，先看一看。”

在芜湖，市委书记向胡耀邦汇报：“年广久偷税问题，群众反映很大。”

胡耀邦说：“偷税当然不行。”

按照胡耀邦的指示，省委对年广久采取“先看一看”的态度。但“逐利”是“商人”的本性，年广久也不例外，更不是“完人”。不久，他因瓜子生货枯竭，以每斤1.62元的批发价从芜湖市供销社购买了近10万斤的“迎春瓜子”，随后，“精明”的他又转手以1.75元的价格冒充“傻子瓜子”运销上海，从中牟利8800多元。5月事发，芜湖市工商局没收了他的全部非法所得，并处以2000元罚款。同年10月，上海税务部门又查出他在上海采取瞒报少报营业额、销毁凭证等办法，偷漏税4.3万元。10月12日《人民日报》披露了这一消息。舆论哗然。

12月，芜湖市果品公司贸易货栈因运输紧张，没能按时供应“傻子瓜子”原料。年广久竟不问情由，以为有关部门是有意“卡”他，一怒之下，带了一帮人把市货栈的牌子摘下，倒挂在市委机关

门口，并在自己的货摊门前贴出指责货栈“卡”他原料的通告。有关部门对他进行严肃批评后，他见自己闯下大祸了，又用绳子绑着自己到政府机关主动请罪，听候处理。事后，他扛着货栈牌子，放着鞭炮。到货栈赔礼道歉。随后，他收缩了芜湖的加工厂，把加工点交给儿子经营。自己带着徒弟远去外地“另找出路”。

12月6日，万里、姚依林两位副总理听取国家工商局的工作汇报，工商局负责同志反映：年广久偷税问题发生后，部分同志对他目前的经营规模很担心，提出要限制他。姚依林说：“现在全国个体户600万，不到1000万，比1949年少多了。我们是不主张限制的。”接着又说：“‘傻子瓜子’偷税漏税不对。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迎春瓜子’在后。以前有不少人炒，‘文革’搞光了。‘傻子瓜子’不是坏事，是拾遗补缺。再看一看。财政部门的税收要跟上去。”

接着，工商局又有人建议用国营、集体形式逐渐代替个体，万里拦住说：“不要急急慌慌去代替。”然后，他问道：“‘傻子瓜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年广久不在芜湖了，据说是去了江苏。”

万里批评说：“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讽刺。共产党为什么不出‘傻子’，出了‘傻子’为什么不用起来？”

万里的这个态度又通过各种途径传回了安徽。第二年春节过后，芜湖工商局派人和“逃亡”在外地的年广久商谈，要他仍回芜湖经营“傻子瓜子”。年广久欣然答应了。

3月27日，年广久给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写了一封信，汇报他已回芜湖，并提出了一个当年要生产1000万斤瓜子的计划。他是文盲，只会写“同乙（意）年广久”5个字，他请人在信中写道：“黄书记，我‘傻子’年广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户。虽几经挫折，但我认定党是伟大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别我从外地回到安徽，看到‘振兴中华，建设安徽’八个大字，心情特别激动。我总在想我是吃安徽粮、喝安徽水长大的，怎样才能为建设安徽而贡献我的一点微薄力量呢？去年，我曾用盈利捐献给芜湖3万元做救灾款，1

万元给敬老院，其余钱全部存进了银行。这些钱是人民的。如果我死了，全部交给国家。……这次计划就是我向你和安徽人民立下的‘军令状’。如不能兑现，甘愿坐牢。盼望能得到你的支持。”

3月30日，黄璜就给他复信了：

年广久同志：

你是安徽有影响的个体劳动者之一，各方面都很关心你。你决心开拓前进，以更大的成绩来回答各方面的关怀，这是非常必要的。我预祝你取得新的进步。

我们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项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适当发展包括个体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形式，对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方便群众、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这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政策。我认为只要你的经营是正当的，你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都会受国家的保护。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侵犯你。……

你这个同志是有很多毛病的。有些毛病也是突出的。我们共产党人允许人犯错误，但和赞成完全是两回事。希望你认真学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严格遵纪守法，不要辜负党和政府对你的关心，有错误一定要改，要沿着党指引的正确轨道健康前进。这一原则对你、对其他同志都是适用的。至于有些同志不能公正地对待你，大多属于认识问题，是可以转变的，你也不必过多忧虑。

祝进步！

黄璜三月三十日

黄璜对年广久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安徽省委的态度，这也是安徽省委对于个体经营以及雇工问题的态度。在省、市领导的具体帮助下，年广久重新振作了起来。1984年7月，他成立了公私联营的“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在安徽各大城市和上海、南京、常州等地设立了10多个销售点、加工厂，还在乌鲁木齐市组建了“傻子瓜子”分公司，就地加工，销往西北、华北。公司规模发展到500人之多，年产瓜子1000万斤。

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公开对“傻子

瓜子”表态，他把“傻子瓜子”上升到发展个体经济发展的高度上来说：“还有些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态度让许多对“傻子瓜子”的非议止息了。年广久得知邓小平都“说”上自己了，搞个体的决心更大了。几个月后，他设奖10万元推销“傻子瓜子”，头奖奖品是价值10万元的菲亚特小轿车。为此，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在闹市口都悬挂出了广告词：“你想拥有小轿车吗？请购买‘傻子瓜子’！”设奖第一天，芜湖即卖出62万斤，不到半月，各地卖出460万斤。但这一计划只红火了18天。中纪委发出紧急文件，规定各地“不准搞有奖销售”，这一下打乱了年广久的计划，他的巨大的生产、销售、供应计划全部陷入混乱。之后，产品销不掉，买来的原料堆在家里，瓜子大批霉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3万元。接着，他又在与蚌埠的一场经济官司中败诉，损失88万元，从而失去大规模生产和经营的能力，一蹶不振。

年广久栽了。各地报刊纷纷发表《“傻子”惨败记》、《“傻子”受罚记》、《年广久现象的启示》等文章，对年广久进行连篇累牍地报道，年广久再次成为了新闻人物。年广久走投无路，11月，叫他的秘书彭晓红代笔写了一封“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的信。年广久听过后，又叫彭晓红抄了八份，寄去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妇联、中组部、中宣部等八个部门。

但是，几年之后，1989年10月5日，新华社一条电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安徽省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总经理年广久因犯贪污和挪用公款罪，日前被依法逮捕。”

这时，全国的个体户已经成为泱泱大潮，个体经济已经不再是个新鲜的话题了。作为个体物的典型人物之一，年广久的结局让人们惋惜。但他只服刑两年多。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在讲话

中再次提到“傻子瓜子”，说：“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1992年3月13日。年广久获释，时年55岁。

中国第一家个体私营饭馆“悦宾饭馆”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城市的就业压力非常大。

1978年开始，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逐批返城，返城大潮给城市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1979年2月，国家工商局向中央做报告：“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文革”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北京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林乎加和市委不得不想办法进行疏通，允许人们自谋职业成为疏解就业压力的一个现实的选择。北京市政府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形容当时的情形是“根本没有就业渠道，只有号召待业者自立”。

像其他城市一样，北京的个体经营的大门就此打开。

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的开办者，就属于第一批跨过门槛的人。这位吃螃蟹的，叫刘桂仙，家在王府井附近的翠花胡同43号。这翠花胡同9号就是当年“张勋复辟”的辫大帅张勋的住处，从东口进去，走约莫五六百米，向右手一拐就是他家。她老伴郭培基在北京内燃机厂当炊事员，每月工资六七十元。家里四子一女，老大是知青，在外地；老四和老五都待业在家。找工作比较难，自己是临时

工，想解决孩子就业的问题，希望也很小。

刘桂仙干临时工，也是给人家做饭，做的菜很有味道。眼看着孩子大了却没工作，家里很穷，没办法了。1980年夏一天晚上，刘桂仙听小半导体收音机，里边说东北有一对夫妻，自己蒸了包子上街卖。她一听心里受到启发：“我学了一手好菜，可以开个小饭馆呵。”

这时没有个体户这个词。她跟她家老头商量。老头说：“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呵？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

“那我去申请申请。”

第二天，刘桂仙就去了工商局。

东城区工商局在干面胡同东口，离她家远极了，刘桂仙也没自行车，就靠走。到了工商局，跟人家说想开饭馆，他们问：“你有屋子开吗？”

“有，我把睡觉的屋子腾出来。”

“那你一家搁哪儿睡呵？”他们问。

“上房睡，上房顶。”

办公室一屋子人，听了全都哈哈大笑。最后，他们劝刘桂仙回去，说：“你孩子多、生活有困难，去找你老头单位，要点补助，我们这里解决不了，国家没政策。”

从翠花胡同到干面胡同，要走一个多钟头，刘桂仙天天去工商局，求人家，说好话，不行就要赖。磨了一个月，没空闲过一天，要是一般人早坚持不下去了。刚开始去工商局，人家对她还挺热情，劝她啥的。到后来，去了也没人理她。“又来了，你坐吧。”刘桂仙也不客气就在人家办公室里坐着，他们该干嘛干嘛。接着，她逮着谁跟谁磨。一个月里，刘桂仙每天去工商局，直到有一天，工商局一个副局长终于对刘桂仙说：“刘大姐，你先回去吧，你的事我们再讨论讨论。”这时工商局确实想树一个典型。内部研究了好久，觉得刘桂仙这个人行，是真想干。别人问一问没消息就回去了，她很执着。于是决定同意她干。整整等待了21天后，这事还真成了。工商

局副局长亲自告诉她：“这样吧，先斩后奏，你先开业，然后发照，回家准备去吧。”

一家就干开了。没钱买料，就上郭培基单位，要了一大车废料，旧砖头、破管子、油毡、木头，把家里的屋子打通，又在院里盖了间小厨房、小洗碗间，搭了锅台，挖了地沟，通了上下水……

刘桂仙一次次去工商局都没结果，但她想开饭馆的消息却不脛而走，由此引起了一位记者的注意。一天来了个大胖子记者，叫吴肇祥，找到郭培基，说他是炊事员，聊聊天吧。郭培基就给他沏壶茶，点根烟，按北京人的话来说。侃起大山来了，郭培基开始说想开饭馆的事。结果第二天，郭培基的话就变成了新闻稿被广播了出来。大意是，这家人想开饭馆，有店面，也有厨艺，但买不着粮油。文章直指了粮油关系这个最难解决的问题。文章播出后大约三四天，一个50多岁的老头就去了他家。送去一个粮本。虽然用这个粮本只能买到机米、黑面和高价油，但已是雪中送炭了。

但这只是权宜之计。粮油问题最终还得有个解决的办法。东城区工商局出面了，派老干部老索帮助她疏通关系。老索跑东城区粮食局，跑了很多次，反复说：“只试这一户，你们看着批一点米面油，不以此为政策，不以此为规矩。”粮食局最后才批了条子。

随后，要给饭馆发营业执照了。刘桂仙说：“我们合计了一个名字，叫翠花饭店吧。”但老索提醒说：“翠花这名字不好，听着像窑子，我看是不是改成悦宾‘叫悦宾饭馆’。”刘桂仙点头称好。

有了名字后，此时工商局还没正规的营业执照，工商局自己印了份东西科长签了个字就是“执照”了。

有了执照，郭培基和刘桂仙夫妇就做起了开业准备，可是还少了钱。刘桂仙又去王府井灯市口的一家银行贷款500元。给个人贷款也是新鲜事，老索跑去做保人，利息三厘。卫生部门很严，没有冰箱不让开业。郭培基的小儿子拿了500块钱去买，但一台冰箱得要1000多元。后来商店的经理找了台外表有点瑕疵的“雪花”牌冰箱，大笔一挥，划了个叉，当处理品400元就卖给了他们。又去买了4张旧的小桌，十几把小木凳，4块塑料布，开张那天，手里只有

36块钱。

1980年9月30日。悦宾饭馆正式开业。放鞭炮，就这样开张了！郭培基本来只打算笼下火试炉灶的，把火笼好后他就上班去了。刘桂仙就拿着36块钱，去了朝阳菜市场。只有买鸭子不要票，就买回来4只鸭子。因为她最擅长做鸭子，能用鸭子做出七八种不同的菜。

头一天，能有人来吃饭吗？谁知人排着大队。就顺着这胡同，排出去好几十米。还下着雨，打着伞呢。刘桂仙把4只鸭子，做成好几种，有香酥鸭、麻辣鸭、八宝鸭，一块钱一份，一会儿就抢光了。东西卖完哩，人还不走，还排着。为啥？他们说了：“这顿吃不上，不是还有下顿嘛。”那大队排的，可了不得！郭培基下班回来，一进胡同，瞅见家门口那么多人，还以为家里出啥事了。

这天中午，4只鸭子卖光后，刘桂仙手里就有钱了，又去菜市场，这次买回来7只鸭子。晚上，7只鸭子也都被抢光了。晚上关门，点点钱，36元钱变成了80多元。算算净赚40多元，相当于刘桂仙老伴郭培基一个月的工资了。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从这条狭长的胡同里冒了出来。刘桂仙也没什么经营经验，菜价定得很便宜：一大盘鸭子6角钱、鱼香肉丝6角钱、鸭架子做的白菜汤卖1角8分钱。做一桌席，开始定的标准每人7元钱，鸡鸭鱼肉大虾海参什么都有。刘桂仙自己去买鱼买肉，做30多种菜了。有时还去三河、宝坻、香河那边买大虾、王八和鳊鱼。

北京晚报财贸记者王达人在一次采访中，从东城区工商局了解到，一位40多岁的妇女在3个月的时间里，天天都要去工商局“游说”，争取批准执照，开办她的个体饭馆。北京市规定个体经商只允许经营服务业、维修业，如裁缝、黑白铁加工等，个体饭馆是不允许的，饭馆开起来，肯定是一个突破。敏感的王达人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新闻。

10月7日，一篇不足百字的《本市第一家个体经营的悦宾饭馆今天开业》报道在北京晚报头版中出现。

第二天，北京晚报在头版又刊登了一篇新闻特写《“尝尝看”

笑语满堂》，记者亲历其中对悦宾饭馆的经营情况进行了细致地描写。晚报同时配发言论《尝尝看，好！》。

两篇连续报道在北京乃至全国引起了轰动，国内外媒体闻讯而来。悦宾饭馆成为北京个体饭馆的“第一面旗子”。这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

这个小屋只能坐 12 个人，人更是多，满屋子坐着发肤颜色各异的各国记者，其中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三个记者没吃上开张的第一顿饭不肯走。郭培基想擀面条给他们吃，结果家里的面不够，最后只好向邻居借了点，做了几碗打卤面。才对付了过去。

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在采访郭培基时向他夸口说：“我在三天之内让整个地球都知道你开饭馆。”龙布乐后来在他的报道里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核心。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这时思想还是左得厉害，工商局给悦宾饭馆发执照签字没什么压力，开业后有压力了，生怕出任何一点纰漏，因为他们也没想到那么红火，影响那么大。来吃饭的人多，来采访的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更多。

开张之后，工商局收到了针对悦宾饭馆的厚厚一叠反对资料，争议主要集中在“合不合法”上，因为执照是依据“政策规定”发的。郭培基的前一个单位，还暗地里把这两口子调查了个底掉，后来没发现什么问题才作罢。

其实在悦宾开张之前，上海就已经有人尝试过自己开饭馆，同样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7 月 12 日，上海待业青年陈贵根在华山路上开了一家叫“味美馆”的饭店，这是上海的第一家私营饭店。饭店开业后，舆论就开始议论：私人开店、营业是否合法？如果这些人先富裕起来，能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陈贵根的弟弟陈云根是一家饭店的厨师，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私营饭店工作是否允许？上海市政府财贸办公室两次召开有市劳动局、工商局、税务局、房管局、粮食局等部门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味美馆”开办过程中所暴露的矛盾。9 月 25 日，上海杨浦区一待业青年开了家个体点心

摊“长短亭”。这位对发展个体经济政策是否稳定存有疑虑的青年，取这个店名的意思就是“政策稳定其寿命便长，政策变化其寿命就短”。“长短亭”开张后，从早上四点半开始，一直营业到深夜十一点，分四市经营，生意很好。但四个月后又由于店主月收入过高，富得太快而受到非议，被迫停业。

就在工商局困惑时，影响更大了。几个外国记者吃了后，互相传颂。你告诉我，我告诉你，美国大使馆的人慕名而来。他们找郭培基商量，想在这里包桌，每人十块钱的标准。对使馆的人来说，这是合适的。如果上北京饭店吃肯定贵多了，而当时北京的普通饭馆少，吃饭是一大难题。因此，美国大使馆不仅自己包桌，还给悦宾饭馆做宣传。他们画了很多地图，标明从使馆区到悦宾饭店的路线，然后分发给其他使馆。

在郭培基看来这是绝对赚钱的买卖，因为当时砂锅白菜豆腐只卖一毛九，炒肉丝只有五毛六，油焖大虾才卖两块四。十块钱的标准绰绰有余。按每天两百元的包桌算，一个月的毛收入大概有好几千元。一天做两桌菜，飞鸽牌自行车能赚一辆，当时飞鸽牌自行车大约150元一辆。

好多客人是头一回来，手里都拿着地图，自个儿画的，有的是复印的。他们来这儿吃饭，一是这里的菜确实好吃，大饭店里没有，还很便宜，一个菜只有几毛钱；另外，他们到悦宾饭馆，是来看看，观察观察，上这里捞东西，想从刘桂仙嘴里套点什么。因为北京冷不丁冒出个私人饭馆，这么多年都没有，为什么现在突然就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共产党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中国要往哪里走啊？他们问刘桂仙的净是这些话：“你怎么选择自己开饭馆了？是谁叫你开的？”“这个小饭馆，能开长吗？”“你怕不怕再来文化大革命，整你？说你走资本主义？”刘桂仙说：“我不怕，大不了把挣的钱退回去。我就信一条，跟共产党走，肯定没事！”

他们听了都笑，说她很会讲话。从刘桂仙嘴里，他们套不出啥来。

结果一阵子，来吃饭的，都是外国人，中国人都进不来了。先

后有 77 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刘桂仙。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大小记者二三十号。一看来的记者多，刘桂仙都想哭。为什么？愁的。因为他们采访，不仅要耽误她做饭，也让她没工夫买菜了。好在她家小厨房有扇小窗户，她就叫记者站在院子里，自己在小厨房里炒菜，把窗户打开，他们待在外头问，她一边炒菜一边回答。有些记者来了，吃完饭还不走，东瞅瞅、西看看，问长问短，恨不能住这儿，一来就连着好几天。结账的时候，也让刘桂仙头疼。外国人吃饭，有付外汇券的，有付美元、日元、法郎、马克的。刘桂仙哪见过外汇，担心人家给的是假钱不敢收。

但胡同的人思想还没转过来，大部分人认为刘桂仙搞资本主义，开私人买卖，是跟共产党对着干。看来饭馆吃饭的外国人这么多，就说她是里通外国。街坊邻居也跟她说：“你不怕当特务？”“你现在就是特务！”“瞧好吧，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国家肯定会收拾你。”刘桂仙说：“你们别吓唬我，我不就是因为孩子多，想挣口饭吃嘛，我不怕！”嘴上是这么说的，可晚上一宿宿地睡不踏实。

郭培基的小儿子原本有个挺要好的同学，但家里开了饭馆后，同学再也不来串门了。郭家的孩子去人家那里也不被搭理。郭培基自己上班走在胡同里时，后面也时不时有三两人指着念叨，现在资本主义复辟了，就前面走的这人，他们家开饭馆了，这个人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急先锋。郭培基不敢回头，只好加快脚步往前走。另外，由于做生意总难免扰民，经常有街坊邻居去街道告状。在这样的情况下，郭培基有些动摇，甚至有了关张不干的念头。

正在这时事情又峰回路转。11 月 4 日，北京市政府做出决定，允许个体户经营饮食、小商品。

几个月后快过春节了，悦宾饭店的生意更红火了。春节前一个星期，公安局的人把刘桂仙叫去了，打招呼说：“国家领导人和北京市领导要上你家拜年，你回去准备准备。”

“好哩。”

“别跟孩子们说，要保密。”

回家后，刘桂仙把饭馆里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还买了两麻袋

炮仗。

大年初一，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林乎加陪着姚依林和陈慕华两副总理到北京市给个体户拜年。他们第一站去了前门的“大碗茶”，然后去了西单菜市场。当来到悦宾饭馆时，已是中午，正好美国大使馆的人来这吃饺子过年。

姚依林、陈慕华和林乎加等人来了后，先是把小餐馆视察了一遍。边看边询问饭馆经营的情况，并鼓励刘桂仙好好干。在看了餐馆的菜单后，陈慕华副总理对刘桂仙说：“要把孩子们管好，饭菜要做好，冷热分开。”

姚依林说：“别光做热菜，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

林乎加市长说：“菜要大众化。”

这时胡同里全是人，挤不动，热闹极了。他们走后，刘桂仙把两麻袋鞭炮全放了，足足放了半个多小时。

中央首长和市委领导能到自己的小店来，可见党和政府是支持干个体的，这路错不了。后来，他们买下胡同里的一处房子，大小12间，又开了一家饭馆，起了个名叫“悦仙餐馆”。

悦宾饭馆会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获得与安徽凤阳小岗村那样的标志性地位。悦宾饭馆对于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是这对老夫妇迄今都无法想象的。

以后，北京个体饭馆数量猛增，一两年就达到上万家，成为北京城市商业的另一景象。